

臺灣日治時期

佛教發展與

皇民化運動

「皇國佛教」的歷史進程

(一八九五—一九四五)

闕正宗 著



港台書

臺灣日治時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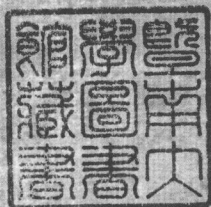
佛教發展與

皇民化運動——

「皇國佛教」的歷史進程

(一八九五—一九四五)

闕正宗 著



B949.2
20126

《臺灣日治時期佛教發展與皇民化運動》

——「皇國佛教」的歷史進程（1895-1945）

著 者／ 闕 正 宗
發 行 人／ 張 瑞 香
總 編 輯／ 楊 蓮 福
主 編／ 李 淑 芬
封面設計／ 皇城廣告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排 版／ 王 立 群
出 版 者／ 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2 臺北市北投區東華街一段 48 巷 8 之 1 號
電話：(02) 2826-1203 傳真：(02) 2823-7374
網址：<http://www.boyyoung.com.tw/>
E-mail：boyyoung2008@yahoo.com.tw
劃撥帳號：18871684
戶名：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皇城廣告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880 號 14 樓
網址：<http://www.namode.com>
電話：(02) 8227-5988
傳真：(02) 8227-5989
ISBN 978-986-6543-42-5
定價 450 元
2011 年 5 月 初版一刷

印 刷／
總 經 銷／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缺頁破損，請寄回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臺灣日治時期佛教發展與皇民化運動：「皇國佛教」的歷史進程(1895-1945) / 闕正宗著. -- 初版. -- 新北市：博揚文化, 2011.05
面；公分. -- (人文；25)
ISBN 978-986-6543-42-5(平裝)

1.佛教史 2.日據時期 3.臺灣

228.33

100008019

序：從新聞記者到佛教史學者

好友闕正宗的博士論文《日本殖民時期臺灣「皇國佛教」之研究——「教化、同化、皇民化」下的佛教（1895-1945）》即將出版，囑咐我寫一篇序，恭敬不如從命的拜讀這本深具歷史學理論、方法、資料、可讀性兼備的學術論文。在閱讀過程中，一直在探索為何一位於1983年畢業於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廣播電視科的大專生，能在二十餘年後成為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佛教史博士？我很幸運的長年在學院中受教育與成長，對於這位在1985年起從事臺灣佛教寺院採訪報導的新聞記者，能在25年中蛻變成當代數一數二的臺灣佛教史學者，感受到非常的驚訝與讚嘆！1994年之前我研究主題是「中國中古佛教史」，從古籍中探討〈後漢三國西晉時代佛教寺院之分佈〉等子題，企圖瞭解印度傳到中國的佛教在社會與文化方面的開展，1995年初，因緣際會的轉向臺灣觀音菩薩信仰寺院的調查。我與正宗在關懷臺灣佛教的發展層面上，有過學術場合的討論機會，但沒有充足的時間進一步互動與瞭解。這幾天賞心悅目的閱讀中，重新查閱正宗的相關著作，逐漸解開我長年的疑惑。一位新聞記者如何成為批判與指正臺灣佛教文化發展的歷史學者？

1985年9月，正宗服完兵役退伍，短暫任職於報社與商業攝影公司，同年12月間，與一群甫由大專新聞科系畢業的朋友，投入創辦不久的《菩提長青》雜誌社，並主導該雜誌的走向。《菩提長青》期刊定位在接引佛教的初機，仿新聞報紙的模式發行，版面配置上第一版是佛教新

聞，第二、三版是佛教修行、信仰與義理的探討，第四版是佛寺巡禮。25年來，定期出刊達五百期的《菩提長青》版面與內容都能堅持創刊初衷而不懈。只是隨著時空環境機緣轉變，於二、三版加入臺灣佛教歷史或人物的研究探討，而第四版在解嚴後，增加大陸或海外地區佛寺的報導。這種接引初機的佛教徒期刊，以免費贈閱而僅靠隨喜的助印功德等不穩定經費，能運作迄今，可見正宗的佛弟子菩提心長青不謝，佛弟子發菩提心，藉著期刊報導來接引初機佛子，伴隨著逐期提昇雜誌內容的深廣度，而同時交互提昇編者與讀者在視野與心靈等層面的境界。25年多達五百期的《菩提長青》，蘊涵佛弟子源遠流長，青春翠綠的弘願。

1989年接掌菩提長青雜誌社發行人，並創辦菩提長青出版社，以出版商的利基點來結集《菩提長青》第四版的佛寺巡禮中各地區寺院的踏察成果，而出版《臺灣佛寺導遊系列叢書》。《臺灣佛寺》系列，由大臺北、桃竹苗地區而逐步南下。但是，出版三冊後，原有的參與者都陸續離開工作崗位，只剩下正宗一人獨立挑起大樑，從文獻資料、田野調查、攝影、撰稿到成書出版，都一手包辦。1992年出版的《臺灣佛寺》第四冊，正宗開始加入佛寺的歷史背景資料。他獨自從大臺北地區到臺南地區，耗費十餘年的九冊《臺灣佛寺》叢書，從無到有，都是他背著相機，帶著一支記錄的筆，一步一腳印，在許多寺院不願配合的氛圍中，都被他堅持為臺灣佛寺留下珍貴第一手史料而突破締造完成。做為一位正信佛弟子的佛教學者，在他堅持為臺灣佛教界報導獨家第一手的佛寺專欄，逐漸在其面對面的佛寺採訪、攝影的對決中，不知不覺的融入臺灣源遠流長的佛教史長河裏。1993年6月，正宗在出版《臺灣佛寺》專輯第五冊的序言〈從歷史層面著手〉：「《臺灣佛寺》系列，每一輯的編輯、撰寫與圖片，皆有計劃地加強與改進。本輯開始把寺院的撰寫方

向導入歷史層面中，寺院有了歷史演繹作基石，再從歷史的角度去看待寺院本身存在的意義，就可一目瞭然地客觀呈現其面貌。〈臺灣佛寺〉採訪編輯是作為臺灣佛教史的先頭工作。」正宗在這篇序言裏，自覺到自己新聞工作本身掌握到的使命感，從而將生命境界提昇到在黑暗、孤獨、挫折中，不斷的追求照破暗夜前那道晨曦與曙光，走向佛教史專業領域。1995年出版的《臺灣高僧》自序：「1985年迄今十年來，我個人還是以採訪攝影的角度來看待佛教寺院的田野調查，對於已然走入佛教史的領域渾然不知。直到二、三年前才驚覺，應以更謹慎的態度去從事佛教史的研究工作。……佛教徒應該有一份歷史使命感，為史料的保存與佛法的傳佈，善盡一己之力，才不致愧對三寶弟子的身份與面對這塊土地的子子孫孫。」佛教徒的新聞記者工作，不自覺的與歷史研究工作結合在一起，兩者又相輔相成，逐次累積提昇其生命境界。

正宗出生與成長在臺灣這塊土地上，作為一個佛教徒體驗、報導島內佛教社經文化堡壘的寺院場域，在每一座寺院接觸的過程中，都秉持著認真、虔誠、慈悲而堅持挖掘真相的精神，在他的筆下一座座佛寺被如實地在臺灣歷史脈絡中具體呈現出來。正如同德川幕府初期的劍道修練家宮本武藏，他巡迴日本國內，面對各個武林高手，他將每一場的劍道決鬥，始終緊握著認真、虔誠、寧靜、置生死於度外的「必勝之劍」，衝決每一場的重重障礙，獲得日本「劍聖」的美譽。宮本武藏在武林高手追殺的困厄中，一度隱居窮山僻壤開墾荒地，自耕自食而激撞出內心的體悟：「劍即是鋤，鋤即是劍。踏在堅實的土地上不忘亂世，身居亂世不忘踏在堅實土地上。依名份回歸原來處，在洋洋大道上仰天長嘯。」然後，告別廝殺與隱居的階段，結合心靈、劍術與土地時代的關懷，溶入當代的歷史時空，著書立說，成為名留青史的兵法家。正宗以他的筆

開墾臺灣佛教的荒地，踏在親切、熟悉的土地上，不忘「肉食妻帶」等佛教亂象，依正信佛子的本份，回歸正本清源的「記者」原點，走向「鑑古激今」的歷史家大道。

1993年夏間，為了深化佛寺報導的臺灣佛教史基礎工作，正宗遠赴日本京都佛教大學參加暑期課程，以通訊自修的方式，攻讀東洋史、佛教等課程。正宗為了工作與研究需要，自我提昇接受學院專業學術訓練。從日本佛教大學通信部肄業（1993-1997），玄奘大學宗教研究所碩士（2001-2004），一路走上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2005-2010）。25年來在職學習、進修的過程中，佛教徒、新聞記者、出版社商人，自我改造提昇到博士級的專業歷史學者，正宗融合這四種身份為一體，站在臺灣的土地上，照見數百年的臺灣佛教史洪流。

1999年《臺灣佛教一百年》；2004年《重讀臺灣佛教——戰後臺灣佛教》（正、續篇二冊）、《臺灣佛寺的信仰與文化》；2006年《臺灣經懺佛事縱橫談》（合著）；2008年《臺灣佛教史論》；2009年《中國佛教會在臺灣——漢傳佛教的延續與開展》、《人間佛教的理論與實踐——傳道法師訪談錄》（合著）等專書十餘冊；〈仁王護國法會與戰後臺灣社會〉、〈清代府城開元寺法燈探源〉、〈臺灣當代華嚴義學弘傳管窺——以臺北華嚴蓮社南亭、成一、賢度三代住持（1952-2009）為中心〉等期刊、學術研討會論文數十篇；〈大山頭擴張、小山頭倒閉〉、〈私利、宗派利益還是殖民主義〉等批判、社論性文章亦達數十篇。正宗的採訪工作與歷史研究視野，在時間的縱度與空間的廣度不斷的拉長與擴充，終於匯萃成《日本殖民時期臺灣「皇國佛教」之研究——「教化、同、皇民化」下的佛教》這本博士論文。

這本博士論文，具體展現他沈澱了漢傳與日本各千餘年的臺灣佛教文化之積綻，聚焦於日本殖民者施加於島嶼的「皇國佛教」烙印，反思日治時期支配者賦予臺灣佛教的「資產」與「負債」，提供世人對臺灣佛教發展更深層的理論、方法與方向之參考。在值出版前夕，謹表祝賀。是為序。

顏尚文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教授

2011年4月16日於新店

序言

闕正宗先生長期致力於臺灣佛教史之研究，近著博士論文《日本殖民時期台灣「皇國佛教」之研究——「教化、同化、皇民化」下的佛教（1895-1945）》即將刊行，要我為其寫序，榮幸之餘，亦感惶恐。然為其學術生涯之重要階段的豐碩成果得以順利呈現，願以此序聊表個人祝賀之意。

正宗尚未進入成功大學歷史系博士班就讀前，即已陸續發表多本有關臺灣佛教之專著，舉如《台灣佛寺（1~9）》（1989-1997，共九冊）、《台灣佛教一百年》（1999）、《重讀台灣佛教——戰後台灣佛教（正、續編）》（2004）、《台灣佛寺的信仰與文化》（2004），及碩士論文《戰後台灣佛教的幾個面向（1945-2000）》（2004）等。雖然曾被質疑快速多產的著作品質，但如是汲汲關注於臺灣佛教史之學習耕耘，恰是為其專業領域的厚實基礎紮根。

2005年，同樣從事佛教史研究的我，欣聞正宗考進本系博士班，總覺得歡喜。因為縱使臺灣學界進行宗教或佛教研究的學人已較往昔增多，然而投注於佛教歷史研究，相形之下，仍感缺乏。難得本系錄取一位純粹研究佛教史的博士新秀，博二時，正宗要我擔任其博論指導老師，能否勝任是我個人首先考量的要素，雖同是佛教史的從事者，但時代與區域大異其趣；一在明代佛教史，一在臺灣佛教史，但共通點也的確就在於同對佛教史的關心。答應之後，平均一到兩個月不等的時間，例行

性舉行研究室學位論文討論會。與正宗討論過程中，我頂多給予問題觀察視角，史料運用、詮釋及撰寫技巧等較屬規範性的提醒與指導。反倒從其報告，讓我吸取諸多有關日據時期的臺灣佛教歷史知識，同時閱讀不少相關的日文一手材料，對我個人來說，無疑是新領域新知識的學習與開拓。

除此，正宗亦積極參與學術研討會及期刊論文的發表，逐一展現對臺灣教史研究的熱忱與使命。自 2006 年起至 2009 年 7 月博士學位取得，前後發表十來篇論文，其中數篇後來撰寫成博論的幾個章節。博論全八章，含表四十六個，圖五十三張，附錄七，全文長達四十三萬字左右，鉅細靡遺地討論日本統治臺灣五十年期間，臺灣佛教如何在殖民政策中被推移演進及從事本質上的改造，因而日據時期臺灣佛教發展的樣貌及其歷經多方的波折，得以讓我們獲得更全面的了解。就此領域之相關研究而言，實屬不可多得之力作，且在日文原始材料的豐富援用，及其對戰前日文資料的圓熟判讀，在在強化其博論的可閱讀性與學術參考價值。於博論口試中亦深受各委員的肯定，稱其史料豐富、內容紮實、具原創性，是學界對日據時期臺灣佛教之各階段發展史較為完整論述的一部著作。值此博論刊行之際，為其感到欣喜，亦期許其未來能夠以更宏觀而多層次的角度，思考臺灣佛教與鄰近區域之間的互動關係，提出更精湛的學術觀點與成果。

陳玉女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

2011 年元月于成大歷史系

目 錄

序：從新聞記者到佛教史學者	顏尚文	III
序言	陳玉女	VII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二章 日僧開教及其活動		13
第一節 從「從軍僧」到「臺灣開教使」		13
第二節 「臺灣佛教會」的組成與運作		33
第三節 殖民初期佛教各宗的教育事業		47
第三章 西進、理蕃布教與宗教調查		69
第一節 日本佛教在福建的活動與「廈門事件」		69
第二節 「理蕃政策」下的山地布教		102
第三節 齋教的初期聯合組織與總督府宗教調查		115
第四章 日系禪宗的教育事業與聯絡寺廟的結成		131
第一節 臨濟宗與曹洞宗的教育事業		131
第二節 臨濟宗妙心寺派與本土寺廟的聯絡		162
第三節 寺廟的「御尊牌」安奉		178
第五章 總督府宗教政策及教界動向		195
第一節 「南瀛佛教會」的組織與運作		195
第二節 「臺灣佛教龍華會」的成立與動向		209
第三節 臺灣佛教的「統一」與「改革」		220

第六章	戰時佛教配合時局的教化	245
第一節	「七七事變」前對大陸來臺華僧的監控	245
第二節	道士、乩童的「佛化」改造運動	258
第三節	「皇民化」與「寺廟整理」運動	266
第七章	佛教皇國化推進與僧侶的角色	281
第一節	「佛教奉公」與「僧侶鍊成」組織	281
第二節	「宗教南進」政策下的臺灣佛教	290
第三節	臺日佛教僧侶的戰時角色	301
第八章	結論	315
參考文獻		330
後 記		345

第一章 緒論

佛教傳入臺灣，一般認為與明鄭時代同時，由於漢民族移民臺灣多屬閩、粵地區，尤其是閩南，故佛教深受福建佛教影響。而在清末咸豐年間，就以臺南開元寺與大天后宮的僧人系譜而言，開始有臺灣僧侶往福州鼓山湧泉寺受戒的情況，這代表臺灣佛教似乎在擺脫過去由大陸僧侶來臺卓錫主導的情況，只是此情況僅維持 50 年左右，隨即因乙未割臺而淪為日本殖民地。往後 50 年，臺灣佛教遂在日本殖民的歷史進程中，朝「教化、同化、皇民化」的腳步前進。

在長年的田野調查中，觀察到許多殖民時代所遺留下來的寺院建築，它們曾在臺灣佛教史上有過輝煌的歲月，並發揮相當的影響力，特別是在中日戰爭爆發的昭和 12（1937）年，「皇國佛教」（或稱「皇道佛教」）一詞被與「皇民化」一詞並用，引發探索動機。

綜觀日本佛教「皇國化」的背景，西元 6 世紀中葉，佛教由中國輾轉經朝鮮半島傳入日本，而最初接觸佛教是以皇室貴族為主的上層階級，也就是說，日本佛教從最初開始就與支配者階級結合而發展開來，雖然幾經變遷，但是到現在仍未脫離這樣的特質，即保有與支配者、權力者、富有者緊密的關係。作為支配者的宗教，首先，為增進支配者個人及其家族的幸福，並避免不幸，而將支配者及其所支配的國家一視同仁，在有關國家的幸與不幸的祈禱十分重要，故而日本佛教多與國家主義結合。¹

¹ [日]渡邊照宏，《日本の仏教》（東京：岩波書店，1994），頁 70-72。

日本佛教以皇室為中心的佛教，是在欽明天皇（539-571）時代傳來，之後其中屢被日本佛教提及的皇室成員聖德太子（574-622）就是一位崇佛者，他在世時興建了以四天王寺、法隆寺為首的 46 座寺院，² 最重要的是聖德太子發佈所謂的 17 條憲法，其中第 2 條明載「篤敬三寶」，³ 被認為是「皇國佛教」的象徵。而從奈良朝、平安朝至鎌倉時代，日本佛教皆是以皇室為中心，各宗的宗祖乃至碩德高祖之間，與皇室關係匪淺者眾多。⁴ 從日本政治神話神武天皇「開國」起算至明治時代，共 120 代天皇，其中出家受戒的天皇共 37 人，后妃為尼者 74 人，皇子 233 人，皇女 67 人，⁵ 可見佛教與日本皇室的關係十分密切。

奈良黃金時代興建東大寺、造大佛，在地方建國分寺，證據顯示皆是透過政府權力運作。而就在受國家保護養育的奈良佛教成長時，政府不得不遷往平安京，新國都與新佛教都成為必須，最澄（767-822）的天臺宗與空海（774-835）的真言宗符合這樣的要求。最澄自言「使法久住，守護國家」，空海則標榜「鎮護國家」。不過，天臺與真言並非真的與國家勢力結合，而是依賴與天皇及貴族的個人關係。然而，這二宗直至今日仍維持鎮護國家的立場，而其內容則依時代而有所變化，即使在中世紀、近世、二次世界大戰時，作為「第一義」降伏敵國的祈禱是屬於

² [日]小林一郎，〈日本は佛教を重ずる國〉，《禪の生活》第 10 卷 3 號（1931 年 3 月），頁 42-49。

³ [日]小林一郎，〈聖德太子佛教興隆の御精神〉，《禪の生活》第 10 卷 4 號（1931 年 4 月），頁 27-31。

⁴ [日]石川素童，〈後醍醐天皇の勅諭と總持の遵式〉，《禪の生活》第 13 卷 11 號（1934 年 11 月），頁 38。

⁵ 不著撰人，〈皇室と佛教〉，《佛教》第 19 號（1890 年 11 月 28 日），頁 30。

這二宗派寺院的工作。⁶

曹洞宗兩大本山之一的總持寺，開山祖師常濟（1268-1325，瑩山紹瑾）從後醍醐天皇（1288-1339）獲賜十種勅問，並在元亨元（1321）年成為勅願道場，翌年，後醍醐天皇將總持寺定為曹洞宗總本山，並下賜紫衣，⁷顯示其與皇室之關係深厚。

淨土宗特別發達是透過德川家的保護，日蓮宗的國家主義則是非常特殊，日蓮（1222-1282）透過《法華經》的預言，藉由蒙古大軍來襲而逐漸受到注意，並成為國家主義的高度表徵，而日蓮所主張的國家主義，在明治時代又復活。明治 13（1880）年，田中智學（1861-1939）所創始的蓮華會（後來的立正安國會、國柱會）就是顯著的例子，此會鼓吹法西斯主義，影響了政治家與軍人。⁸

乙未割臺，開啟日本殖民臺灣逾半世紀的統治。在明治維新「脫亞入歐」的西化運動中，日本佛教各宗受「廢佛毀釋」的影響，神道國家主義的路線，「神佛分離」令下，寺院、佛具受破壞，僧尼被強制還俗，僅僅 5 年，傳統佛教受到毀滅性的打擊。從明治 10（1877）起，在以今日東京大學前身為首的數所大學，開始以實證主義的方法來研究佛教，伴隨而來的是南條文雄、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荻原雲來的諸學者赴英、德、法留學，學習到歐美的實證主義學風，並將之導入日本。⁹

1637 年，日本九州西側島原半島與天草諸島發生了「島原之亂」，

⁶ [日] 渡邊照宏，《日本の仏教》，頁 76-78。

⁷ [日] 石川素童，〈後醍醐天皇の勅諭と總持の遵式〉，《禪の生活》第 13 卷 11 號，頁 38-39。

⁸ [日] 渡邊照宏，《日本の仏教》，頁 79-81。

⁹ [日] 西嶋和夫，〈日本仏教と明治維新〉《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46 卷第 2 號（1998 年 3 月），頁 824-825。

信仰天主教的教徒發生暴動。幕府為了強化對天主教徒的壓制，實行了所謂「宗門改」制度。改宗制度早在「島原之亂」前即逐步實施，「島原之亂」之後，則全面地、徹底實施，此一制度即「寺請制度」，也就是「檀家制度」。在「寺請證文」制度之下，建立「宗門戶口名簿」，為了禁止全體百姓信仰天主教（日蓮宗不受不施派亦在禁絕之列），每一家庭（檀家）都必須歸屬佛教某宗之某寺。僧侶掌管了婚姻、生死、旅行等事的檢查和證實，凡是不履行檀家義務者，都被認為有信天主教之嫌，可能有牢獄之災。由於僧侶的權力過大，帶來不少流弊，隨著德川幕府統治的結束，明治維新改變了「檀家制度」二百餘年的歷史。¹⁰

明治維新的「廢佛毀釋」，終讓佛教徒覺醒，這種覺醒是清除德川幕府以來的舊弊，回歸到佛教的本質「僧弊一洗」（去除僧侶弊陋）的精神。雖然佛教具有革新的熱情，但是，這不過是為了貫徹護法精神的一種復古運動，還不能說是真正的佛教近代化。而以此為契機而邁向近代化的自覺，並伴隨著與外來文化及基督宗教的接觸，導致信教自由的運動抬頭。¹¹

但是，明治2（1869）年，淨土宗率先以「秘密請示」的方式，向政府提出願意放棄佛教乃「三教之盟主」的地位，放棄過去傳統認知神道與儒教乃佛教「左右大臣」的印象，接受「神道為基本，佛教為輔翼」的原則，之後真言宗高野山也有類似之舉。¹²此時各宗40餘寺的僧侶組織「諸宗同德會盟」，翌年，在東京、大阪舉行大會，共持續5年。「諸

¹⁰ 藍吉富，《認識日本佛教》（臺北：全佛文化，2007），頁284-301。

¹¹ [日]雲藤義道，〈明治期における仏教現代化の問題點〉《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46卷第2號，頁843。

¹² 張大柘，《宗教體制與日本的近現代化》（北京：宗教文化，2006），頁154-155。

宗同德會盟」總結出 8 條課題：（1）王法佛法不離之論（2）邪教研窮毀斥之論（3）自宗教書研覈之論（4）三道鼎立練磨之論（5）自宗舊弊一洗之論（6）新規學校營繕之論（7）宗宗人才登庸之論（8）諸州民間教諭之論。其中「王法佛法不離之論」，是沿襲幕末佛教的護法論具體化——護法、護國、防邪的一體觀，進入明治新政體之後，獲得真言宗、淨土宗、東西本願寺派一致的支持。而「三道鼎立練磨之論」的「三道」是指神道、儒教、佛教，是表明三教一致教化國民，這也是江戶時代以來佛教在對抗儒教及復古國學排佛論的說法，而在此時提出，或許是補強了以神道為中心，儒佛為輔翼的神國觀念。¹³

明治 22（1889）年憲法頒布，翌年教育勅語頒布，國家體制確立，特別是在朝野發起終結幕末與諸外國訂定不平等條約運動的同時，國民自覺的澎湃，催生了國粹主義的勃興。¹⁴ 明治國家體制確立的同時，也確立了「明治佛教性格」，一是實證主義佛學之風，一是儒佛輔翼神國觀，而當臺灣淪為日本殖民地之後，這樣的佛教性格隨著各宗佛教從軍僧來臺開教而傳入。不過，若說日本佛教完全沒有反省之聲恐怕亦未盡公允。如明治 32（1899）年 2 月，由境野黃洋、田中治六、安藤弘、高島米峰、杉村縱橫、渡邊海旭、加藤玄智等人成立的「佛教清徒同志會」（1903 年改名「新佛教徒同志會」），翌年發行《新佛教》，當明治 39（1906）年 6 月 9 日，政府發布訓令防範社會主義、自然主義的傳播時，《新佛教》即批評政府壓制精神自由，所提倡對皇室、國家的報德主義，鼓吹武士道精神，為「獎勵萬世一系的島國愛國心」的陳腐觀念，之後《新佛教》屢遭取締，終於在大正 4 年停刊。明治 43（1910）年 5 月，

¹³ [日] 柏原泉祐，《日本仏教史近代》，頁 20-23。

¹⁴ [日] 柏原泉祐，《日本仏教史近代》，頁 56。